

文心文事

陈乐民

没想到编一卷，办四册，竟管
 事心。文字算上通，写进血里地
 几卷书看一版的，也就罢了。也各编之故事
 自珍，笔底奔之可恨，一也比较了解的朋友
 说我是“空”家，那是好听的恭维。说译作
 至此，叫做“通”
 上，有样子的东西不学，可是更多得
 物上，不知深浅，说“好说如不读是解”，连我带，
 竟自说“其训若有憾焉”从书和比书才有“证据”
 是就解词润明。再文的
 吧，我有自己也很难说如
 自己到入的一个
 睡觉，我的职业本是研究国际问题，与
 国际主义研究，也许是叫的“趋势”了。对
 叫“国际问题”了就是研究
 何也，所以叫其他要用学必有
 学是半站学学教者，所加入“海卷”了，事
 把那书没有“福”的观念，又这既就是中间人
 研究外国事。
 史，心一起本想觉得“国际问题”不止是文成者，
 一也独立的“学相”。有人记那叫“语言学”，有人为注
 “是也，我思，社会科学
 章，文、史、政、经。西国际问题至少跟的学作的信作
 更有关系，物博与政史史的作者。
 国际问题
 个算“历史学”的人，
 说，那史学字句行，可一信
 不管的也字句，正已上说如信化书托中，
 叫得制第一行，一居一居也，供于制出作



读 * 书 * 文 * 丛

文 心 文 事

陈乐民

(京)新登字007号

读书文丛

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封面设计,叶 雨

宁成春

文 心 文 事

WENXIN WENSHI

陈乐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111,000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ISBN 7-108-00504-2/K·78

定价 4.40元

自 言 自 语

(代 序)

没想到编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竟然会费这许多心力。大半辈子过去了，写过的东西没有几篇能看上眼的。那就算了吧。无奈偏又敝帚自珍，觉着弃之可惜。一些比较了解我的朋友说我是“杂”家，那是称赞的意思。说得好听点儿，叫做“通才”。不料坏就坏在这“杂”上了：看样子懂的东西不算少，可是大多浅尝辄止，不能深究。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未免有些“其词若有憾焉”的矜持劲儿，似乎有意效颦陶渊明。其实的确是“半瓶子醋”。结果，我自己也很难恰如其分而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划入那一个“行当”(专业)里。

按说，我的职业本该是研究国际问题。其实说不上研究，无非是以此“起家”罢了。什么叫“国际问题”？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如何如何的。渐渐地我把某国某地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

教等等都纳入“吾彀中”了。虽然那并没有“际”的观念，不过既然是中国人研究外国的事，“际”也就在其中了。久而久之，我越来越觉得“国际问题”不大像一个独立的“学科”。有人说那叫“跨学科”。是的，我想，社会科学主要应是五大门类：文、史、哲、政、经。而国际问题至少跟政、经、史有关系，抽掉了政、经、史的内容，就没有国际问题可言了。它尤其容易跟历史挂上钩。我本来就是有个有“历史癖”的人，总爱追寻什么渊源。历史和哲学也往往可以沾上边。说得宽一些，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心子来。这样，“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便进驻我的庭院里来了。

当然几十年来，我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之集大成者。我常常给青年人重复地讲这个看法，有些看法“浓缩”在收进这本小书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那篇文章里。在我向学生们介绍马克思这本书的时候，兴奋之情每每叫我眉飞色舞。不过，在口焦舌燥之后顿然察觉到他们并没有如我般的感受时，便禁不住内心里浮起一丝缺憾：我没有能使他们分享这快乐。

在很长时期里，我时时想着一个问题，怎样把“洋务”（外国问题研究）和国学结合起来。事实上，我的几分“历史癖”里就溶着几分“国学癖”。想这个问题的起因很简单。一是正文风，二是正学风。这两件事，我以为办“洋务”者多易忽略。写出的文字或者“洋腔洋调”，用的是中国字，写出的却是外国话；或者本来并不难懂的道理，说起来像嘴里嚼沙子；又像是本来一张不太难看的脸，硬给拉长了，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严肃相。难道写这类文章非这样不可么。从我们的传统讲，左传迁史都是范本。从近代讲，叶圣陶、朱自清那样写普通人的话，难道不可以借来正我们的文风么。

第二是正学风——也是方法问题。有过一段，有一阵风，不加选择地把自然科学里的一些方法用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上，时称“国际关系学”，这是舶来品，美国某些大学里最盛。（实则人家那里并不叫什么“学”，只叫国际关系的“理论”或“分析”，没有一个专名词。说是“学”是我们给起的学名，以示其专门和正经；我们是非常喜欢叫“××学”、“××学”的。）那方法都说新得很，据说不懂这些就是所谓不懂“理论”。譬如，讲很普通的事也画很多很复杂的图表、画各种各样的曲线、列各种各样

的数学公式……据以得出对某事的抽象概括或论断。职业所系，我曾横下一条心，蹒跚在图书馆里，半年时光看了近三十本这样的书，看不懂也硬着头皮看，后来发觉有些道理用常人说的话就可以说清，却给说得天花乱坠，问题的实质反倒被掩盖或被忽略了。我管这叫做“简单复杂化”。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门“玄学”。总之，看了三十本书，写出一篇文章（至今被同行视为介绍此学的首篇，实在冤哉枉也），把这门学问介绍了一番，最后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既然有这门学问，就应该了解它，但是要心里明白，许多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不足取法。以后我没有继续钻这门时髦学问。不料文出之后，青年人感兴趣的竟是我介绍的东西，还嫌我介绍的太少，我最后说的“不足取法”的看法几无人理睬。也有人理睬了，一封不短的读者来信，把我骂了一阵，说我那最后一段话是拒绝新事物云云。

其实，治学之道，本没有什么花花哨哨的东西，老老实实地做去就是了，走捷径不行，想讨俏也不行。尤其是治文、治史（国际问题也不例外），脱不出太史公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积累丰富的资料），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话虽过简，却是千古不易的经验之谈，舍简求繁、求“玄”，真划不来。

我快变成反其道而行之的“国粹派”了，讲课或辅导学生时，几乎有点矫枉过正地提倡读些左丘明、太史公，提倡“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说《左传》里的曹刿论战何等简约，《史记》里的项羽本纪何等气势，司马光笔下的赤壁鏖兵何等威武……然而，青年人虽然听得入神，却多瞠目不知所云，似乎在问：这一切都不错，可是与我们学的国际关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倒也是，怎么能让楚霸王跟拿破仑挂上钩呢；我只能说，中国的书读多了，总可以帮助你们把文章写得有中国气派一些吧……显然，这没有搔到痒处，可是这是一个中国治文史的学者的根基；靠老祖宗来匡正学风，怕很难叫人信服，不过我仍固执地相信此道不虚！中国的学者而不大懂得中国的学问，可乎？

瞧！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国际时事抛在一边，串进历史学的门径里去了。既然进来了，就还得唠叨下去。一旦进入史的庭院，思想的翅膀就不由自主地向更广阔的空间飞去。如果把历史仅仅当作讲故事，或当作“大事记”的积累，那只能算是一种资料性的工作，顶多把事情的过程写得

详之又详，那又能怎么样呢。在一部通史里常凸现出许许多多的“点”，活跃着、跳动着，引诱我不停地去找，像无休止的“连环套”，一环套着一环。比如在欧洲的历史里徜徉，那“欧洲”是怎么来的，今天的欧洲人那么强烈而急切地寻找各民族一体化的路，说是“本是同根生”，那么他们的根在哪里，这根为什么、怎样、又是在何时分成了这许多株树；反过来，这些树之间又怎样在根部相接……在思索欧洲的观念何自来的时候，我遇到了希腊罗马文化，遇到了基督教文化，甚至瞥见了阿拉伯文化。从基督教文明我走进了中世纪；一进入中世纪便无法摆脱神学和经院哲学。同时也感到了公元九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欧洲觉醒的躁动。这条路线一路把我带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这一路，我感觉出欧洲有一根神经跳动得不紧不慢，那是作为“神学婢女”的哲学在“闹独立”。待欧洲大步迈出中世纪的门槛时，迎面而来的是岛国的培根、洛克，大陆的笛卡尔、斯宾诺莎……他们的哲学结束了中世纪。“连环套”的下一个“环”又把我“套”住了……

欧洲历史的阶段性那样分明，而每进入一个新阶段，则必有与之相应的时代印记十分鲜明的

哲学。欧洲的历史同它的思想史扣得真是紧。笛卡尔只能生活在笛卡尔的时代。“我思故我在”，固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但与“神在故我在”何等不同！及至看到一生足迹不出乡里的康德竟提出用“世界民”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未来时，读这段文字的人自会感到社会和时代都大大前进了。

中国的情况则另有风韵。在中国，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以后，直到清末结识了“国际社会”以前，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历史，都习惯地被人按朝代划分，朝代与朝代之间自然各有不同，一个朝代的早中晚期也不相同。思想界大而化之至少也有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的区别。但是那不绝如缕的、很有韧性的连贯起来的线，却使史的阶段性的不像欧史之分明。哲学是社会的影子，社会向前移动不多，哲学也不会向前挪动太大。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哲学再也比不上先前的博大精深、气象万千。欧洲的希腊传统继承下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风范器宇则在后来的历史里变了味儿，看不到诸子百家时的磅礴恢宏、欣欣向荣的气概了。

中国哲学别于西洋哲学的另一点是，前者似不及后者唯心、唯物地分判得那样清楚。说气在

理先就是“唯物”，理在气先就是“唯心”，可是同一个朱夫子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又那样说，大概他自己也没有弄清楚。何况在中国哲学里时时出现的“天”、“人”、“道”、“神”、“太极”、“太和”、“理”、“心”、“性”等等概念，内涵究竟是什么，几乎全凭哲人的见仁见智，甚至须靠各个人难以言说的悟性。

中国的古书实在也太简约了。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古代哲学喜欢‘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因此需要后人“把古代哲学家们要说而还没有说的话替他们说出来”，“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这就要看“这个哲学史工作者对于古人的理解的能力和程度”了。他还进一步向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提出，应该“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找出他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①

这些话说得真是深入浅出到了极点，同时也道出了治中国哲学之难。相比之下，欧洲的哲学史家们要轻松多了、幸运多了。除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留下些断篇残简以外，留下来的哲学资料比

^①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37、38页。

我们的要完整得多、系统得多。西人写起文章来不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话留半句，讲起一个道理来可以没完没了地拉不断、扯不断。看了他们的书，谁个唯物，谁个唯心，谁个“二元”，一般可以略知一二。西方的哲学工作者不必作他们的中国同行们的事——把前人没讲出的话补足；也不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所以他们那儿出不了朴学，用不着乾嘉学派。假如有一天，苏格拉底与孔夫子对话，康德和王夫之一块儿出席国际会议，翻译怕也帮不上多少忙，大概得靠旁人的“比较研究法”在他们中间打通。

看起来，两大文明相会，免不了误会。

既然相会，就会比较。这“比较”就另有许多文章了；有的根本没法儿比；对于那些可比的，也不能简单地比孰优孰劣，而是比出它们的相通和殊异来。中西两大文明，都是异质奇珍，各有殊功，比优劣极易失之浅薄，或单凭比较者的本人好恶；比相通，则难免生拉硬拽，牵强附会。钱钟书先生有两句话说得极好：“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阂。”^①最容易办到的终是见其殊异，因殊异而见“两美”之所以美，“两贤”之所以贤；当

^① 《谈艺录》，钱钟书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第351页。

然其丑而愚之处也不会因而打了马虎眼。

有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就是：凡学问都是一通百通的。能在“内心深处”悟解一种文化之要谛者，对另一种异质文化的要谛也能在“内心深处”加以悟解，甚至臻于通解，在彻悟里融会贯通。那当然是很高的境界，有些像刘勰说的：“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必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对于这种境界，我这辈子怕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了。

到今天，我似乎离开我几十年前刚步入的外事工作相当远了。近十年来，我青少年时养成的、后来时受干扰的读书癖又大大地“旧病复发”起来。不用说“文革”期间，就是在过去累于案牍或“跑码头”（我们对外事工作的戏称）的年月里，读书也常是身外之物，只能放在“业余”时间里。即使如此我也不曾须臾离开过书。但我的藏书曾遭过两度劫难。住在国外的那几年，我把《唐宋小说笔记》、《宋六十名家词》、《缀白裘》等等都带去了。后来离开那个国家后没有再去，可惜那些书即因此不知所向。这是我的第一次“书劫”。几年后，“史无前例”的年代来了。先是我的老哥哥借了一

辆平板车，含着眼泪把家里的藏书亲自送到了指定的地点；接着是我在所在的单位被勒令上交“黑书”。这是我的第二次更大的、也是更彻底的“书劫”。过了几年，少数上交的书被“落实政策”，大部分没有发回。因此我特别珍爱后来陆续购置起来的书，绝不忍再离开它们。那些早已结识过的书，包括内容已然淡忘的，只要一浮现在脑子里，就觉着慰贴，因为它们几乎陶冶了我一生；也许，肯定的，它们还将滋补我的不太长的来日。

现在该回到“杂”字上来了。由于“杂”，所以每当有人问我的所谓“专业”时，我总说不准，也想不准，便解嘲般说是“万金油”。外国人喜欢问对什么感兴趣之类的问题，我就说：对什么都有兴趣！年轻的同行认真地让我“介绍经验”，我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便借用两个人的话算作“经验”。一是鲁迅劝人千万别相信“小说教程”之类的话。再一个是齐白石，据说有人问以书道，他竟说：想怎样写就怎样写可矣！我当然不能比鲁迅、齐白石，我体会的只是重在实践吧。

这本小册子收进的文字笼统地属于杂学、中西之交、欧史三类。大多属于读书笔记一类。至于作为我的“本行”的国际时事，虽然写了不算少，但

一篇也没有选，因为那不仅与这本小册子的性质不太合，而且大部分都像燃了半截的蜡烛，点完了，也就完了。选进的大半是“业余产品”。但我却认为这些东西倒能反映几分真正的我。我想，我之“杂”即在此。至于内行看了是外行，外行看了像内行，就顾不得了。

陈乐民

一九九一年八月于

东总布陋室

目 录

1	自言自语(代序)
1	第一编 文心文事
3	“唯陈言之务去”——漫话韩愈的散文
16	细哉文心——读宗璞《南渡记》
28	伏尔泰的《历史哲学》
42	难哉译事
55	“过眼小辑”七则
55	——陆凯与陈寿
58	——李卓吾批唐太宗
62	——“大秦”与“黎轩”
68	——顾宪成
71	——高攀龙
73	——“五人义”
76	——易心生则学不进
81	第二编 中西之分

83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在华活动的 “三起三落”
108	谈谈徐光启——《徐光启集》读后
127	中西之交 义理分殊——谈马勒伯 朗士与“中国哲学”
142	历史与展望——中、西(欧)交流发 展之我见
159	第三编 欧史钩稽
161	“欧洲观念”探源
172	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一种观察 欧洲近代史的理论视角
193	海涅论德国哲学——兼及哲学与 “政治文化”的关系
205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